

弁言

李鴻瓊*、邱彥彬**（專輯主編）

本專輯的目的一方面在引介當代義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但更重要的則是透過阿甘本，試驗在當代台灣進行西方思想研究的模式，以催生全球化時代可能的理論或比較文學研究範式。以阿甘本作為對象，一方面固然是因其在晚近人文思潮上的重要性，以及他對當代全球化的生命狀態所進行的概念化工作，但同時也因為他思想的特質與東方有較親近的關係。他理論的核心概念，諸如「無言」(infancy)、「無能」(impotentiality)、「無為」(unworking或inoperation)、「無生」(decreation或sabbatism)等，除了與六〇至七〇年代初期高舉「拒絕工作」(refusal of work)口號的義大利工人運動息息相關之外，則如本專輯於徵稿啟事所特別強調的，較貼近東方反造作、反生產的思想，而他確直接討論龍樹等東方思想傳統，是西方理論家裡少有嘗試與東方進行深入對話者。

但這個理論實驗自然不意在進行比較哲學或者思想影響的研究。一方面，比較文學理論研究的特點不是在於已建制思想的分析、闡述與整理，而是在斷裂、空白、死亡、不可能之處求介入式或創造性的思想言說——傅柯(Michel Foucault)應會稱此為批判哲學，而從阿甘本的角度來看也可稱為思想的「範例」(paradigm)或「發生」(taking-place)(見李鴻瓊於本專輯論文)。若此處暫允我們將哲學視為建制化、學科化的知識

*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系統，則這裡涉及的是哲學與理論在本體層面上的根本差異。換個方式說，六八年的思潮是在現實與思想的空白處出現的，這是它與結構主義的重要差別，也說明了死亡這一詞為何一直佔據著它論述的核心，因建制的界線、外部或邊緣就是它的因緣。

從七〇年代開始著述的阿甘本自然也是這個因緣下的思想「發生」案例，正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德勒茲(Gilles Deleuze)、中後期拉岡(Jacques Lacan)等理論家一樣，但阿甘本也跟他們不一樣。後結構主義是在空白中進行實踐，是與「事件」一體的。但阿甘本不是直接內在於事件中，其位置應接近「鄰人」：後結構是從死亡中回來的，並且留下了事件走過的空白痕跡，「第二代」理論家的阿甘本則是鄰於空白，他的理論可以說是在邊邊說明思想的空白條件，這是他實踐作為理論「當代人」的一種方式：與理論的斷裂條件維持一種親近關係並加以闡述。這可以是「第二代」理論家，包括巴丟(Alain Badiou)的挑戰：後事件的「忠誠」以及知識層面的整理。

這說明了阿甘本對「無」的偏好，這是理論出生的本體條件：真正讓創造性知識典範出現的不是知識的原因，而必須是本體的因緣，此即其知識的外部性，也是其知識的「可知」條件：或者說，沒有本體上的斷裂，後結構作為一種特異的知識就不會出現。這個本體層面的關懷應該是阿甘本理論的核心，這呼應了楊志偉在其論文〈詩學之於生命恆餘：阿甘本論述中詩學藝術作為生命一形式典範之可能〉中將重點放在「生命」上，並闡述「典範生命」的意義。而這個本體關懷因為是就理論「無中生有」的基礎來說的，因此也必然引來拉克勞(Ernesto Laclau)、奈格利(Antonio Negri)等強調實際政治造作者的批評。但除了考量阿甘本所承襲班雅民(Walter Benjamin)的彌賽亞主義路線之外，我們也可以說，西方社會或者現代性的困境與其制度化、外部化、生產性、程序性相關，因此如何與反造作面向連結，以及生命如何脫離統制式決定或部署便也是思想工作的一大重點——全球化是可以視為一個完整作動介面的建立。在固定機制、程序或部署中執行動作者便難以說具有「主體」能

動力，這是阿甘本為何要強調無為的原因，也因此，造作與無為、能與「能不」、去主體與主體化便不是對立的選項，而是相結合的。這一點楊志偉在其論文裡有著清楚解說，而他以詩為例子也的確能說明這種無中生有的語言實驗如何在卸去一般語言使用之下進行語言的創造。

另一方面，本專輯理論實驗的目的是在架構一種阿甘本與東亞之間的斷裂式交通：東亞跟阿甘本之間的親近關係是建立在隔斷或「阻斷」的關係上，是一種無關係的親近。他的龍樹或「東亞性」是他處理西方問題的彌賽亞主義對應項，並無法直接連通或「運動」到東亞，而東亞透過阿甘本可以與現代性或全球化產生的相關性或作用也仍帶有隔斷的狀況，無法簡單越過個別世界的獨特情境。這是廖朝陽在其論文〈緣定與善：阿甘本的潛勢倫理〉裡強調內外分離——或者「體觸」(gesture)所產生的局部與整體區分——的重點所在：整體性的運動(各種因緣的聚合)一旦個體化就需依循局部情境的特性，否則直接入侵就會導致暴力的出現，但被局部化或阻斷的整體則轉為「潛勢」(potentiality)，且在不斷變化與運動中與局部維持連動關係，讓固定的價值與善惡可回到未定、隨緣的運動或「潛正確」狀態，否則局部的固定化也會轉為超穩定或「超正確」，此也是暴力的來源。

從這個角度看，李鴻瓊在其論文〈臨界台灣：阿甘本、佛教與《海角七號》的範例〉裡所做的試驗——讓阿甘本與佛教思想相互閱讀與震盪，以相互打開彼此的內部，建立一種跨(思想)世界的理論研究模式——也同樣堅持個別狀況或世界的獨特性：跨世界的普同必須無礙於事物各有其時節因緣，一如廖朝陽的「緣定在」(*quodlibet ens*)概念因為同時兼及事物的隔斷特異以及隨緣的普同平等，因此可讓背反的雙邊相互溝通、轉化。但這裡涉及的並非單一狀況，而至少是兩種緣定或特異世界的比較閱讀。如果李鴻瓊嘗試透過這個理論層面「任何特異」(兼及兩個世界的特異與普同)的方式來建立解釋對象(台灣或《海角七號》)的最大化(既可容受理論又保有其真實)，那麼兩世界的親近性顯然是建立在某種外部或邊緣變化之上。廖朝陽特別強調思維必須與外部變化維持互

動關係，因此特別取用「緣定」一詞，以突顯不可隨意、任何的意思。這個緣定自然並置了佛教特殊的思想世界，因此這裡涉及的是兩個世界（西方與東方）之間的關係。按照特異隔斷的倫理考量，潛勢空應出現在另外一個層面上。廖朝陽在註14裡解釋，他「思想翻譯」所採用的策略是調動東方的思想資源，讓阿甘本理論的邊緣外部得以啟動，以重演他概念的生成過程。邊緣外部指的是概念的緣生過程，也就是思想如何被生產出來的細部分子層次。換句話說，兩個世界仍是隔開，但透過雙向閱讀的方式可以在雙邊的邊緣都啟動思想分子化（重演概念生成的因緣變化），並透過雙邊互震以及個別思想世界的內外連動，產生跨世界的隔斷交通。我們因此或許可以說，這是進行跨世界理論研究的緣定在模式。

在廖朝陽與李鴻瓊的作法裡，由於西方理論與東方思想同屬後設層次，因此較容易進行這種雙向解釋、分子化的實驗——若是理論與解釋對象之間就較難做到，因為關係不對等，除非可以一步就進到事物重重無礙的理解，否則還是從理的層面出發再回到事，較能透過層次的持續轉換打開事物的空間。這需要透過多重演練，在不同世界之間來回，持續翻轉解釋與被解釋的相對位置，才能打開邊緣世界，猶如使用一物的分子來撞出另一物的分子，但嚴格來說這裡的運作不是對撞或破壞，而是攀附（跟隨其緣）、接受緣定、產生反身關係；對事物各有因緣的理解才是「愛」保存物物特異、各有其時的基礎，這應可呼應廖朝陽對「可欲性」以及楊志偉對「共群」的強調。而以上所描述、整理的理論研究模式也自然會帶有特異的一面，因此本專輯的目的並不在建立一般的「典範」，而是希望透過這個分子層次的思想實驗，共振不同「世界」的讀者與研究者，召喚出某種比較文學研究的可欲性，以有助於人文思潮的更新與創造，促進同代不同時（全球化共同情境下的特異）台灣或東亞理論運動。

本專輯是《中外文學》前任主編朱偉誠教授於其任內發起、籌劃、執行，從2012年起至今經過多次討論、轉折，方於現任主編蕭立君教授任內完成。對於朱教授的支持、鼓勵、協助，我們十分感激，而專輯無法

於他尚在任時即完成，我們甚感可惜，在此謹特別向朱教授致上謝意，也感謝蕭主編以及執行編輯簡秀婷小姐於專輯從最初規劃到最後完成的各階段所提供的建議、支援與協助。